

文学律法的伦理光照：卡夫卡《审判》新论

廖 奕

内容摘要：从创作背景看，只有将卡夫卡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独特的思维方式、法律经历和具体的促动事件整合一体，将宏观解释和微观分析有机结合，才能真正看透《审判》背后的审判，以及实在法背后的“文学法”。从内容主旨看，《审判》是卡夫卡苦心孤诣打造的“穿透”法律之作。通过对法律本质的文学拷问，卡夫卡内心认同的文学律法成为超越现实法律的神秘源代码。就基本特征而言，卡夫卡文学律法范型独特、原则明确、结构开放、诠释多元。在《审判》中，文学的伦理裁判才是最接近真理的真正“审判”。未来的“文学法理学”应当在“法律与文学”基础上实现新的超越。

关键词：卡夫卡；《审判》；文学律法；文学伦理；法律与文学

作者简介：廖奕，法学博士，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包括法理学、法律与文学。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社会矛盾法律化解机制研究”【项目批号：11CFX001】和“2011 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研究成果。

Title: Literature Law and Ethics in Kafka's *The Trial*

Abstract: We can really see through literature law behind positive law and another trial behind *The Trial* by the method of macroscopic interpretation and microscopic analysis to integrate Kafka's social cultural environment, unique way of thinking, legal experience and activation of specific events in the background. Kafka tried to penetrate the essence of law in *The Trial* from the point of theme. Through a literary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law, literature law that is identified by Kafka becomes the mysterious source code beyond the positive law. In terms of its basic features, Kafka's literary law has its unique paradigm, clear principle, open structure and pluralistic interpretation. In *The Trial*, literature ethics is the real "trial" as closer to the truth. Literary jurisprudence in the future should go beyond the movement of "law and literature".

Key words: Kafka; *The Trial*; literature law; literature ethics; law and literature

Author: Liao Yi is professor at Law School of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His research areas are jurisprudence, and law and literature. Email: fxyly@whu.edu.cn

卡夫卡，这位布拉格的法律博士，称得上是天资峥嵘、贡献巨大、影响深远的卓越“法律人作家”（Posner, “Kafka: The Writer as Lawyer” 207）。作为其唯一与法律直接相关的长篇小说，《审判》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审判》不仅被改编为各种戏剧、电影、严肃音乐，而且为诸多司法意见书正式援引，“围绕它的解读争议甚至将一场新学术运动推向高潮”（Dargo 521）。对于这部充满魔力的作品，本文将从“文学律法”的新视野，

通过对作者心灵世界和创作理路的还原，开掘被研究者忽略的文学伦理意蕴。

一、切入法律的文学

西方文化从一开始就渗透着法律的技术和意象，文学作品中的法律主题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的历史谱系：“从《欧墨尼得斯》（*Eumenides*）、《安提戈涅》（*Antigone*）到《凯恩兵变》（*The Caine Mutiny*）、《虚荣的篝火》（*The Bonfire of the Vanities*）、《他自己的狂欢》（*A Frolic of His Own*），这些‘法律与文学’作品都着迷于法律本身”（Posner, *Law and Literature* 3）。在这种文学传统中，法律往往以悖论形式存在，在被辛辣嘲讽的同时，又是不可缺少的秩序参照。对卡夫卡而言，“歌德、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狄更斯这些他崇敬的前辈都与法律具有某种矛盾性关联”（Pinaire 142）。在他们的经典作品中，文学不是为了法律写实，成为一种普法工具——恰好相反，法律叙事是为了铺垫映衬文学故事——这在卡夫卡的《审判》中得到了坚持和升华。

申言之，卡夫卡创作《审判》究竟意图达到怎样的文学目的？如果他仅是为了沿袭“法律与文学”的传统，为什么舍弃现实生活中层出不穷的冤假错案，煞费苦心去虚构一个带有鲜明自传色彩的K的故事？《审判》以这样的话语开篇：“一定有人诬陷了约瑟夫·K，因为，他没干什么坏事，一天早晨却突然被捕了”（《卡夫卡全集》3:3）。在“无故”的背后，是否潜藏着某种有意的必然？如果存在这种必然，它究竟代表了怎样的伦理导向？这些问题，对于理解《审判》背后的文学律法与伦理主题，至关重要。只有将卡夫卡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其独特的思维方式、法律经历和具体的促动事件整合一体，将宏观解释和微观分析有机结合，才能真正看透《审判》背后的审判，以及实在法背后的“文学法”。

就社会文化环境而言，卡夫卡是“捷克-日耳曼-奥地利-犹太混合体的产物”（Salfellner 5）。卡夫卡是生活在捷克人圈子中讲德语的犹太人，他所讲的德语不同于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德语，而是一种被称作“布拉格德语”的少数语言，一种书面德语和形态语言的奇异混合。多种文化的冲突性熏染让卡夫卡始终处于身份迷失的临界位置，在社会疏离的孤独和追寻真理的幸福中摇摆。独特的社会文化身份让卡夫卡几乎别无选择，除了“少数文学”，除了“局外人的法理学”，除了一以贯之的“家园”探寻，无所可依。从《失踪者》中被父母放逐异乡的少年到《审判》中对居住城市不断感到陌生的约瑟夫·K，直至《城堡》中的外乡人K，在卡夫卡的小说中，“外来者”总是最常见的形象。面对各种不可能性，卡夫卡通过几近绝望的探寻，最终发现了希望的光照，试图通过文学律法的伦理之门，将自由的真理从黑暗洞穴中牵引出来。在《审判》中，K虽然是一个大银行的高级职员，但一直都不能融入主流文化。当他被宣布逮捕时，“他回忆起几件并不重要的小事，有几次他不顾朋友们的劝告，丝毫不考虑可能产生的后果，有意识放纵自己，最后闹得几乎不可收拾”（《卡夫卡全集》3:6）。

对卡夫卡而言，自由意味着真理。父权的阴影一直笼罩着卡夫卡，挥之不去。卡夫卡将自己的父亲形容为坐在靠背椅里主宰世界的专制暴君，因为，“他具有一切暴君所具有的特征。其权力基础是个人基于权势的喜好，而不是思想的说服力量”（Weisbrod 699）。世界因此在卡夫卡眼里一分为三：一个是他生活的奴隶世界，其中布满各种专门的法规，必须完全符合这些条条框框；第二个世界就是父亲生活的暴君世界，一刻不停的统治，发号施令，因命令不被遵循而动怒；第三个世界才是理想的自由世界，这是一个所有人都幸福生活，不受任何命令和戒律约束的世界。不无巧合的是，根据《审判》中法院

画家的说法,开释正好也有三种可能性:“真正宣判无罪、表面宣判无罪开释和无限期延期审判”(《卡夫卡全集》3:124)。真正宣判无罪、完全清白无辜的人在法律上是罕见的,因为理想的绝对自由可望难即;诡称无罪开释可以使人获得法律的暂时自由,但所有的罪行都将被完好封存,法律程序随时可能复查重启,这种状态类似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法律限制的“自由”;而无限期延期审判只能凭借当事人与法院的关系而定,只要案件永远处于未做最后判决的初审阶段,人们可以在罪责待定的前提下“自由”生存。从延期审判到最后判决,没有确定的界限,就像暴虐的父权不可揣度一样。

卡夫卡在法学院的学习经历和之后的职业生涯,让其在倍感自由难能可贵的同时,探寻出了一条独特的文学创作之路。卡夫卡在大学时本想选择哲学专业,但几经更换,最后学习法律。习法并非他的真实志愿,而是迫于个人生计和父亲意志的无奈之举。虽然如此,他还是顺利完成了学业,22岁时获得了法律职业学位,之后从事保险法律事务工作。从职业技能和表现来看,卡夫卡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优秀法律人。除了出庭、调查,他热衷于法律公文写作,“将工业技术和保险法规的细节描述得异常明晰”(Dargo 519)。不容否认,卡夫卡的法律学习和实践,强化了他知识的广度和推理的深度,为其文学创作不仅提供了饭碗保障,而且开辟了想象空间。然而,他始终没有从伦理上接受法律的规训,现实的法律与其内心的自由和真理难以相容。法律对其而言,只是职业,而非“志业”。法律是一种谋生方式,而写作则是一种祈祷形式。相比于成为一个优秀的法律人,高度私我化的自由文学创作方系终生理想。卡夫卡总是在写作中与自我对话,意欲穿透表象,进入真理,完成自由生命的终极圆满。在《审判》中,法律不过是叙事材料,故事的名头——真正的实质,与司法制度、诉讼程序、法律技术无关,而与生命的自我反思、归罪和救赎有关。

1914年的卡夫卡处于人生的重要转折点。此时,他刚完成第一部长篇小说《失踪者》,正在寻求更大的突破。他的职业生涯处于稳定的上升期,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工作和社交,与文学创作发生了冲突。他似乎可以摆脱父亲的影响,但父亲的权力依然存在,不自由的感受反而更加强烈。此时的他在感情上经历了风波,解除婚约过程痛苦纠结。在“旅馆庭审”中,面对未婚妻菲利斯朋友的控诉指责,卡夫卡“从头至尾一言未发,婚约最终被取消”(Klima 120)。数周之后,卡夫卡开始写作《审判》。这时,“他不再把时间浪费在情书往来和社交活动上了,旅馆的庭审引起他充分的思考和丰富的联想,一个被告约瑟夫·K的形象萦绕心头,呼之欲出”(杨恒达 126)。在《审判》中,主角K被指控,第一次审问就发生在他隔壁的F.B.女士(卡夫卡在书信中称菲利斯为F.B.女士)卧室,F.B.女士在小说最后神秘露面,当时K被两位刽子手拖走,并被“像狗一样”处决。“当卡夫卡和菲丽丝在柏林漫步并低头求婚时,他一定对自己也有‘像狗一样’的同感”(Banville 230)。卡夫卡要排除一切妨碍其文学自由理想的因素,从家庭、职业到社交、婚姻,概莫能外。任何外在事务都不能影响他的思绪,即使是德国向俄国宣战这样的大事,他也只是在日记中一笔带过。卡夫卡的忠实信徒加缪也认为,《审判》的成就是圆满的,除了尽在不言之中的反抗和绝望,关键在于其包孕的不可思议的行为自由(叶廷芳 107)。在《审判》中,卡夫卡寻求的是安身立命的终极法理,从实在法的技术角度分析其中的片段,或者用新批评学派“去作者化”、“非意向化”的诠释方法,都难以准确把握《审判》的主旨内核。

二、穿透法律的文学

柏拉图《理想国》的洞穴隐喻表达了人们对于真理本质的可怜无知:人们被缚蹲在地

上，背对亮光，看到的世界不过是映现在地牢上的影戏。1912年在旅途中的卡夫卡阅读了《理想国》，对他来说，真理的图景更为复杂：犯人完全意识到其屈辱的监禁处境，同时又有一种着了魔似的求知欲，由于其倔强的行为和不停赌咒发誓，监狱当局表现出某种不怀好意的宽宏大量。为了满足犯人的求知欲，狱方在牢墙上嵌了几面镜子，由于地牢四壁凹凸不平，这些镜子成了一面巨大的哈哈镜。囚犯看到了一幅幅清晰的图像，目光不再虚空，因为眼中有了理想的现实映像。他们以无与伦比的学究神情观察着每一条线的弯曲，每一张脸的变换，不断将每个偏离现象速写记录。一会儿用这一角，一会儿用那一角，作为他们无穷计算的出发点。他们热切地希望这些计算将成为真理的几何学（叶廷芳 170-171）。

由此，卡夫卡敏锐发现了“洞穴”的原初性，他的许多作品都以地下世界作为发生场景。《审判》中的法院有两类：一种是K想象中的司法大厦中的法院，一种是K现实遭遇的潜藏于民居阁楼的法院（《卡夫卡全集》3:85）。前者或许富丽堂皇、庄严神圣，后者则是条件简陋、空气污浊，活生生的另一处地洞！其实，洞穴的最奇特之处是边缘，边缘虽然仍属物体，却往往总是望向虚无。边缘是物质世界的边哨，虚无则不存在边哨。《审判》中的“法”总具有洞穴的构形，在法的洞穴内里，潜藏着一个无底的深渊，一种永不完结的过程。

在法律洞穴深处，究竟有怎样的秘密？通过对法律本质的文学拷问，卡夫卡的答案是“虚无”。法的本质就是没有本质，或者说，法律的秘密就是一片空旷。而这种虚无的空旷，正是卡夫卡内心认同的绝对自由，它只存在于私我的文学王国，秘密被独家垄断。文学律法的存在，是自由得以定在的关键，也是现实法律构造和运行的神秘源代码。

在这种哲思的导引下，卡夫卡借助表现主义“向内看”的创作手法，启动了《审判》的法律穿透之旅。卡夫卡创作《审判》之时，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表现主义运动方兴未艾，表现主义追求的内在真实、梦幻世界、怪诞风格、强烈感情和酷烈画面，都在《审判》中留下了鲜明印记。但卡夫卡毕竟不是一个纯粹的表现主义者，他的创作已不能满足于内观与叙述，而要达到“思维小说”的高度。在《审判》中，卡夫卡的哲学思考与文学表达力求融合，没有概念，没有体系，有的只是想象的世界，既充满生动的具象思维，也饱含缜密的逻辑推理。在写作中，卡夫卡尽力克服犹太德语晦涩难懂的缺点，虽然这对于表现主义而言，恰是一个难得的优势。他力求推理和文笔如法律般质朴精准、明白晓畅，但在命意和主旨上却处处遮蔽，让人一不留神就落入精心设计的迷宫和陷阱。

面对《审判》，现实主义者将其解读为反映资本主义世界法律罪恶，尤其是司法迟缓和腐败的生动教材；存在主义者倾向于从中体察法律和人生的无奈与荒谬，即使保障人权的现代法律同样也是自我悖谬、无法理解的“怪灵”；理想主义者会在实在法的绝望中发现自然法的希望，毕竟，在乡下人临死的一刻，“火光”有了喷薄而出的迹象。说到底，卡夫卡构造的“审判”与其说是一场法律诉讼，毋宁说是一种思想实验。通过K的以身试法，卡夫卡的真正意图是穿透现有法律的表象，揭示文学律法的深层伦理。从表面上看，《审判》没有清楚的时空定位，也无明显的结构和情节发展，有的只是周而复始的事件。但审判过程其实处于螺旋上升的动态结构——莫名其妙被控的K，渴望获得一次公正的审判——终极指向的主体正是K始终见不到的“最高法”。卡夫卡没有写完《审判》，不是让我们满怀惊奇地停步在悬崖之上，这一行为或许是一种隐喻，代表了永远处于动态阐释中的真理状态。《审判》的德文题名 *Der Prozess*，原意就是“永不完结的过程”。在K的案件

中,法律诉讼基本停留在预审阶段,但他对最高法的探究始终如一,未有止境。

学者们对于《审判》中的“最高法”存在多种解释。一种比较有影响力的观点认为,乡下人和K临死前感觉到的“神秘之光”,正是小说最虔敬的时刻,这与犹太法很相似(Butler 6)。结合卡夫卡的犹太文化身份,这种说法似乎站得住脚。的确,卡夫卡与犹太文化难以分离,犹太教的上帝审判和原罪观念对其文学创作影响巨大。但我们必须注意到,卡夫卡构造的文学世界与犹太律法也有诸多背离,最明显的就是《审判》中的最高法官一直隐而不彰,如果它是上帝的化身和象征,这种缺位是犹太法不能允许的。事实上,卡夫卡直到人生后期才正式开始研究《犹太法典》。从《审判》中教堂里那段K与教士的对话来看,犹太法也非卡夫卡心中的最高法模本。教士和K围绕着犹太律法的注经争论,正好说明了人们对这种法的理解充满歧义,它并非代表真理的最高法。

那么,卡夫卡《审判》究竟揭示了怎样的法律本质?家庭法、国家法和宗教法,都被他一一否弃,他心中的“最高法”到底藏身何处?德里达通过细致的文本解读,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法既不是五花八门的,也不像是某些人认为的,是一种普遍性通则。它始终是一种习语,它的门只关系到你——惟一的、特别为你注定、确定的一个门”(144)。在他看来,法从本质上不可接触、不可理解、不可违反,它就像一部“原始”文本,任何改变它、毁损它、修正它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虽然它的指向和目的并不具有同一性,本质也不可读、不可知,但它的“形式”却显示出一种应受绝对尊重的个性(德里达 145)。法是没有自己历史的,就在于它的诞生是神秘的,迄今无法科学解释,其存在方式是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但正是这种无历史的法,才是永恒的化身,才具有绝对的权威和效力。法自身的规则如果有,那也是一种习惯,一种内部掌握的神秘知识。任何人只能对属于自己的“法”产生关联,这种法或许就是最高的法。

这样的“法”对普通人而言,当然是一种充满神秘力量的强制和诱惑,但它仍然不是卡夫卡理想中的最高法。这种法是现实法律机制发生效用的秘笈,但并非最高法的本质。在卡夫卡看来,最高法实际上寓于无穷尽的真理探寻过程之中,它并非确定的实际存在,而是一种内在于个体人生的伦理自由。《审判》中的K想从外部探知最高法的秘密,采取了一种对既定法律戏谑、利用和逃避的策略,被最终证伪。在大教堂内,当神父问K对于案件下一步的打算时,K表示希望再争取一些帮助,利用所有的可能性。神父非难地说:“你过于依赖别人的帮助了,尤其是女人的帮助。你不觉得这种帮助并没有用吗?”但K的回答是:“事情并非总是如此。女人的作用是很大的。倘若我能动员我所认识的女人一起为我出力,我就一定能打赢官司。特别是这个法庭的法官,几乎全是些好色之徒。预审法官只要远远瞧见一个女人,就会把审判桌和被告撤下,迫不及待地追她”(《卡夫卡全集》3:170)。可见,K是普通人的化身,既受到社会排斥,又渴望融入社会;既追求形而上的天国幸福,又迷恋形而下的现世安宁。他既是被告人,也是加害人。对他来说,在各种宗教和道德规范荡然无存之后,法律义务和伦理责任显得虚无缥缈。K总在寻求一种外部的高级法拯救,却没有发现真正属于自身的法,承担属于自己的伦理责任。在真理的洞穴中,K看到了细微的光亮,却错误认定了光源,直到生命终结,仍未彻悟本源:“他的目光落在采石场边那幢房子的最高一层,那儿的一扇窗灯光一亮,蓦地打开了,窗里出现一个模糊、细瘦的身影。突然,他把身体探出窗外,双手远远地伸向前方。他是谁?是一个朋友?一个好人?一个同情者?一个想帮助他的人?他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还是整个人类?现在帮忙还来得及吗?是不是有人提出了过去被忽略了,然而有利于他的论点?这样的论点

肯定有。虽然世界上的逻辑是不可动摇的，但它无法抗拒一个想活下去的人。他从未见过的法官在哪里？那个他永远无法企及的高级法院又在哪儿？他把双手举向天空，张开十指”（《卡夫卡全集》3:183）。

在《法律门前》的寓言里，“法”居住在无人知晓的内宫，是神秘莫测的世间主宰。当卡夫卡将“法”的大门毫不吝惜地向读者敞开那一刻起，对“法”的理解便成了人的宿命和权利。乡下人虽然无缘最终见到“法”，但是通过在门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观察与研究，他对“法”的理解有了不断的飞跃。守门人必须认真对待乡下人，因为，求见“法”这一行为代表了神圣的可能性。对最高的法律真理，守门人与乡下人都是无知的，他们都是法律进程中的迷失羔羊，都是被审判的对象。遍览《审判》中的法律人，他们其实也只是卑微迷茫的守门人，并不掌握真理，对K的罪行也无法弄清前因后果。所谓的法律事实不过是一种“证据的虚拟”，在有无真假之间顾盼往返。他们只知道，对法的命令必须绝对服从，法律理由可以有很多，并一定都是真理，但一定要装成“真理”，用神父的话说就是：“用不着把他的每句话都看作真理，只要当成必须如此就行了”（《卡夫卡全集》3:177）。在此意义上，K和法律人并没有分别。在法的终极真理面前，法律人也是普通人，他们与“外行”一道都是伪旁观者，都在消极服从的同时，积极寻求规避和突围的密道。

在《审判》中，卡夫卡极尽心力地塑造了一系列生动鲜活的法律守门人形象。这些形象大体可分为：（1）初级代表，或者说是法律之门的第一道看护者。逮捕K的看守和监察官，正是这一形象的代表。用看守的话说：“我们的机构从来不去民间寻找罪行，而是像法律所说，被罪行所吸引，这才不得不把我们这些看守派出去。这就是法律，它错在什么地方？”（《卡夫卡全集》3:7）。（2）正式代表，即作为裁判者的法官。《审判》中的预审法官只是低层司法官员，但他掌握着从搜查逮捕到调查取证的巨大权力。在K的心目中，这些人模样猥琐、不学无术、性格古怪、贪财好色。（3）延伸代表，即那些在暗处影响司法的非正式力量。在《审判》中，法院延伸到民房、画家的阁楼、律师的私宅，因为法官的权力必须与这些因素打交道。虽然法院和法官是司法公权正式意义的代表，但实际上影响法官裁决的隐蔽权力主体流散于社会的各个角落，包括了解法院内幕的画家、律师、洗衣妇、女仆、厂主、神父、甚至法庭的听众、法院阁楼楼梯上玩耍的女孩子们。

这些守门人的命运，与K具有同一性。他们是一个个不具名的K，在洞穴中依循着折射的光线，从各自的角度记录着真理的数据，试图建立科学的几何学，但无论如何改变不了他们的囚徒命运。但他们没有K的不安分，从未想过越狱，逃到外界从另一种立场审视自身的处境。他们的法律永远只能在黑暗的洞穴中适用，见不得真正的阳光。

与法律人相比，K其实处于更接近法的有利位置。虽然他没有任何公共权力，只是一个银行职员，但他对法律抱有坚定的理想和天然信任。当被宣布逮捕的那一刻，他还执着地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法制的国家，人人安居乐业，所有的法律都得以贯彻，谁敢闯进他的住所里侵犯他呢？（《卡夫卡全集》3:5）K坚信法律会自动起作用，虽然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可能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但K不喜欢法律人的行径，对他们的一切都到厌恶和可笑。与乡下人的虔敬顺从不同，K内心不安，行为乖僻。K的叔叔希望通过律师帮助他处理这个棘手的案子，K最终拒绝，因为他希望通过更直接的关系干预实现彻底无罪的开释。K一直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对既定的法律程序公然藐视和破坏，非但不为自己的罪过进行及时、有力的辩解，反而更进一步的挑起事端，扩大事态。这样的异端，注定会被法律机器碾碎。

三、再造法律的文学

无论是父权至上的家庭法,还是国家主导的官方法,抑或上帝为尊的宗教法,都不符合卡夫卡的自由理想。如同在法庭上义正辞严宣扬改造整个法律制度的K,卡夫卡也在不断寻求文学王国里的最高法,希望通过文学律法的伦理光照,改变现实的法律困境。“从伦理的意义上说,在人类制度真正产生之前,体现伦理秩序的形式是文学,如希腊的史诗和悲剧。即使在人类的社会制度形成以及有了成文法以后,文学仍然是社会制度以及不成文法的文学表现形式”(聂珍钊 17)。卡夫卡的《审判》,正是穿越成文法局限的文学律法典范,以强大的伦理光照,再造法律,恢复神圣。

在《审判》中,卡夫卡刻意隐藏的文学律法,其实正是无数解读者不断追问的“最高法”。“文学在本质上是伦理的艺术”(聂珍钊 14)。卡夫卡视文学为生命的全部,希望通过写作突破人生的“不可能性”,《审判》正是他费尽心血的文本结晶。他对《审判》寄予了极大的期望,因为这是代表其文学律法的核心文本,具备伦理裁判的权威。在其中,卡夫卡对法律加以文学省思,对文学移用法律隐喻,试图以文学正义丰盈法律正义,以文学律法赓续法律伦理。虽然接近文学正义也要通过重重关卡,层层跃进,但他坚信自己永不完结的创作终会揭示最后的秘密,将真理之光引入黑暗的洞穴。K的死亡,暗喻着现实法律之门关闭,而新的文学律法之门徐徐打开。卡夫卡的伦理见识、文学雄心与法律才能,在《审判》中相得益彰,完美契合。

《审判》中的文学律法意味着一种独特的范型,这种范型是以明确统一的个人风格为中心的。时至今日,“卡夫卡风格”已被确定为反抗专制和权力滥用的专门语词。卡夫卡之所以不喜欢僵化机械的法律,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依凭权力的规则总是忽略被统治者的感受,创立规则的人经常违反法律。在他的文学中,作者既是立法者,也是体验者,必须保持规则统一,逻辑如一。这与法治社会的理想状态不谋而合。更深层来看,卡夫卡风格显示的是人类挫败和自由意志的矛盾统一。卡夫卡自认为他是现代主义的最后象征,代表了一个不能适应却要勉强容忍的时代。在卡夫卡式的悲情抗争之外,还有一层重要的含义,那就是卓别林式的幽默。他在《审判》中对法律程序的夸张处理,将普通人物性格和日常情态推向极端,就其根本而言,他是为了用轻松的审美气氛实现深刻的伦理教诲。卡夫卡的遗嘱透露了他的思想秘密,将文学作品变成思想学说,是比喻性的文学获得经久性和朴实性的特点。“在自然性和非常性之间、个性与普遍性之间、悲剧性与日常性之间、荒诞性与逻辑性之间持续不断的张力作用下”(叶廷芳 105),卡夫卡的文学律法风格得以形成。

真理的不可判定性和创作自由的主体性,是卡夫卡文学律法的基本原则。卡夫卡认为,“真理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它无法认识自己,谁想要认识它,就必须是谎言”(《卡夫卡全集》5:11)。在《审判》中,火光既隐喻真理,也代表灵感。文学作品和法律起源一样,都是理性难以解释的奇迹。所以,对卡夫卡而言,文学是高度私我化的创作,只有坚守文学自由的主体性,作品才能具有独特范型和明确主权,从而有效发挥伦理教诲的公共功能。这两项原则确立了卡夫卡文学律法的核心旨趣,那就是突破外部规限,不断接近真理,彰显文学自由。《审判》是真实世界的凝缩,也是卡夫卡文学王国的主权宣示,以之为标志,卡夫卡开始真正成为自己的国王,为自我的成就找到了安居的乐园。卡夫卡以《审判》立约,既是对自己的定格,也是对后人的教诲:在现实的困局中,不受假以真理之名的欺骗,坚守属于自我的人生法则。

阅读卡夫卡，必须接受其文学律法的伦理前提，否则就是非法的入境和侵略。第一，善恶难以理性判定，伦理具有情境相对性。“魔怪有时获得善的外表，甚或完全化身其中。如果它不在我的面前暴露，我当然只有败北，因为这种善比真正的善更吸引人”（《卡夫卡全集》1:34）。如果法律扯下伪善的面具，个人也只能“软弱而悲哀地进入恶之中去”。这不能归咎于个人的恶性，而只能作为基本的客观事实加以必要的接受。第二，文本主权者独立自治，不可更改。在卡夫卡的文本中，主体的叙事也是文学主权者的思想折射和意志再现。在《审判》中，作者与故事主人公的重叠性非常明显，卡夫卡非常迷恋这种半自传体的写法，这如同是一种理想化的个人生活志和思想录，由此产生的文本具有强大的伦理感染力。第三，找到属于自我的专有通道，不必等待他人的承诺、授权和允许。乡下人不能见到法恰恰是因为他在等候法的允许。K的错误在于，固执认为进入法律是其自然权利，没有意识到个人责任。有如乡下人，K总是在寻求进入法律之门的外部援助，始终未能向内审视。归根结底，他们都没有领悟到必须建立属于自己的自由通道，因为，“自由与伦理和责任紧密相关”（Marino 118）。

就文本系统的形式特点而言，卡夫卡的文学律法具有明确的“中心－外围”的开放式网状结构。对《审判》来说，《法律门前》是中心文本。《法律门前》原是一则单独发表的寓言，后被卡夫卡嵌入小说中，成为类似于序言的纲领性文本。《审判》的编排存在多种可能，卡夫卡生前并没有为之排序，因为他一直在保持文本的开放和形成最后文本之间犹疑不决。为了保持文本的原意，卡夫卡设计了一种网络化的意义关联系统，实现彼此补充、相互诠释、自我纠偏的目的。他对自己作品不满意，因为他认为作为律法的文学文本只有不断理解、诠释甚至续写、重写，才能接近真理、实现自由。这就需要作者与读者建立一种特殊关系：作者不断延展，读者不断重读，作品的生命力可以在动态过程中保持旺盛。

《审判》正是这样一部互动性的文本，与从书面到展演的戏剧逻辑不同，它将展演的戏剧世界凝缩为书面的文本，通过一连串的动作与过程表现动态的规范形象。与单纯的文学剧本不同，卡夫卡的文本试图建立一个自足的世界，读者既是观众，也是批评家，甚至可以是助理导演、临时编剧和客串演员，在对其作品不断细读重读中发现“法”的真谛。因为，每一条法律都藉着自己的定义和其他法律的定义，确定自己的效力方位。法条从来无法单独理解，也无法单独使用，一定要构成彼此互证的文本体系，才能发挥效用。理解《审判》，一定要辅之以《城堡》、《在流放地》、《判决》、《变形记》等卡夫卡的其他作品，在过程和网络中完成意义的澄清和法则的发现。

要让这套独特的文本系统顺利运转，必须具备几个条件：第一，语言风格的统一；第二，体裁和形式的多样化；第三，争议的可裁判性。前两点是文本形式的要求，第三点是文本效果的反应机制。卡夫卡说：“形式不是内容的外部表现，而是它的刺激，是通往内容的大门和道路。这种刺激产生了作用，隐蔽的背景就显现出来了”（《卡夫卡全集》5:495）。语言可以诡异奇谲，但不能风格混乱，这会让文学律法难以维持基本的同一性。但文学创作又不能为了同一性，牺牲最为重要的多元自由和界限突破。所以，在保证语言风格一致的前提下，必须不断探寻体裁的多样性，让文本的表达形式更为贴近心灵的真相。对自己作品的反响，卡夫卡其实是很看重的，他在生前已经有了较大名声和不少的追随者。卡夫卡在与他们的谈话录中，表现出的平等、睿智和精准，让人印象深刻。他宛如一个公正无私但又权威至上的法官，对所有的模糊、歧义与争端都能和平、理性裁断，轻松化解于谈笑之间。

对其作品,卡夫卡在《普罗米修斯》中预见了结局的多种可能:第一,陈词如旧,原样保存,如同普罗米修斯的神话;第二,合理诠释,有所深化。普罗米修斯被钉在悬崖上,痛苦万分,渐趋陷入岩石,与之融为一体。第三,随着时间的流逝,古老传说被各方彻底遗忘,文学的律法也难逃消失的命运。第四,留下了不可解释的“山崖”。法律文本会消逝,被遗忘,但法律的问题和传统不会因此阙无。人们可以不用去追寻立法的原意,也不用去煞费苦心编造新的传说,但必须直面真实基础上产生的遗迹和问题。对卡夫卡而言,留给后世的遗产,一定要足够精粹,能都成为抵抗遗忘的永恒山崖。他对自己的作品,或曰文学律法的文本,如同法律般苛责。他在审判中找到了有罪与无罪之间的新地洞,一扇可以随时逃遁和新建的神奇之门。进入这道门,需要密码,他希望自己拥有,同时他人也能凭借自由的本真破解并获取,共同参与王国的建设,让文学成为每个人的“避暑行宫”。

虽然卡夫卡从未在学理上表达过对国家法权威的任何质疑,但他还是成功创造了一种想象性的文学律法,对现代性状况加以伦理反思和整全理解。他的《审判》虽然没有社会学法学的理论外观,但让我们超越了对法律是一种社会控制工具的认识,将文学与法律的本质统一于经验化的人生哲学。虽然对于《审判》的任何读解都注定是不完全的、肤浅的、臆测的,但这不妨碍每个人都应去不断阅读它,尤其是深入理解其文学律法的伦理意涵。

结语:超越“法律与文学”

从19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法律与文学”研究运动异军突起,对主流人文社会科学理论都构成了直接的挑战。为了回应质疑,法律与经济分析的代表人物波斯纳加入了这场运动,围绕卡夫卡《审判》与多位学者展开了激烈论战。他指出:“法律与文学领域充斥着虚假的前提、有偏见的解释、肤浅的争论、轻率的概括、浅薄的理解”(Posner, "The Decline of Law as an Autonomous Discipline: 1962-1987" 761)。作为顶尖法学家的波斯纳毕业于耶鲁大学英国文学系,对文学一直保持着专业关注和美学欣赏。但他的批评意见仅仅涉及到“法律与文学”的方法论、研究纲领和诠释技术,没有看到更深层的误区。由于“文学律法”的概念未得到准确厘定,文学文本和文学批评理论总是被法学家作为法律分析的依附性素材和移植性技术,而非独立客观的研究对象和学术谱系。“法律与文学”基本上是法律人主导的独角戏,文学被高度边缘化,文学批评成为法律修辞的工具和手段,文学中的律法和伦理主题也被悬置架空。这不仅损害了文学批评的自主性,也阻碍了法律理论的创新。

面对卡夫卡《审判》这样一部“法律与文学”的核心文本,法学与文学应当达成实质性的交融,形成新的“法理文学”(Glen 22)。对法律人而言,从文学中可以淬炼出法律哲学、法律理论甚至法律实务技巧,但如果一开始就以法律的实际需求为出发点去吸纳文学的价值,不仅方向错误,而且目的不当、动机不纯,偏失自然难免。这种“法律化”的文学或许满足法律人的审美与智识需要,但对更广泛的公众而言,这种进路代表了法律的专断,对文学自由的侵蚀,甚至是对私领域的觊觎和心灵控制——这正是卡夫卡毕生反对的梦魇。基于“法律与文学”的内在问题,以及文学自主性的核心背景,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对《审判》中的“文学律法与伦理”进行了初步探讨,希望这一新的尝试能在一定程度上矫正偏失,让卡夫卡的“法理文学”世界焕发本然的光彩。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Banville, John. "A Different Kafka."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8 (2013): 17-19.
- Butler, Judith. "Who Owns Kafka?" *London Review of Books* 5 (2011): 3-8.
- 《卡夫卡全集》第一卷，叶廷芳编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年。
- [*The Complete Works of Kafka*. Vol. 1. Ed. and trans. Ye Tingfang.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1996.]
- 《卡夫卡全集》第三卷，章国锋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年。
- [*The Complete Works of Kafka*. Vol. 3. Trans. Zhang Guofeng.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1996.]
- 《卡夫卡全集》第五卷，叶廷芳 洪天富编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年。
- [*The Complete Works of Kafka*. Vol. 5. Ed. and Trans. Ye Tingfang and Hong Tianfu.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1996.]
- Dargo, George. "Reclaiming Franz Kafka: Doctor of Jurisprudence." *Brandeis Law Journal* 1 (2007): 495-526.
- 德里达：《文学行动》，赵兴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
- [Derrida, Jacques. *Acts of Literature*. Trans. Zhao Xingguo.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8.]
- Glen, Patrick J. "Franz Kafka, Lawrence Joseph,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Jurisprudential Literature." *Southern California Interdisciplinary Law Journal* 1 (2011): 11-22.
- Klima, Ivan. *The Spirit of Prague*. Trans. Paul R. Wilson. London: Granta Books, 1998.
- Marino, Kevin H. "Toward a More Responsible Profession: Some Remarks on Kafka's *The Trial* and the Self." *Seton Hall Law Review* 2 (1983): 110-20.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1(2010): 12-22。
-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ts Fundaments and Term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 (2010): 12-22.]
- Pinaire, Brian. "The Essential Kafka: Definition, Distention, and Dilution in Legal Rhetoric." *University of Louisville Law Review* 3 (2007): 113-56.
- Posner, Richard A. "The Decline of Law as an Autonomous Discipline: 1962-1987." *Harvard Law Review* 4 (1987): 761-80.
- . "Kafka: The Writer as Lawyer." *Columbia Law Review* 4 (2010): 207-16.
- . *Law and Literature*. Cambridge: Harvard UP, 2009.
- Salfellner, Harald. *Franz Kafka et Prague*. Prague: Vitalis Publishing, 2007.
- Weisbrod, Carol. "Family Governance: A Reading of Kafka's Letter to His Father." *University of Toledo Law Review* 1 (1993): 689-723.
- 杨恒达：《卡夫卡传》。台北：业强出版社，1994 年。
- [Yang Hengda. *Kafka*. Taipei: Yeqiang Publishing House, 1994.]
- 叶廷芳编：《论卡夫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
- [Ye Tingfang, ed. *On Kafka*.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88.]

责任编辑：杜娟